「無大台」的創新與局限：評《如水革命》

梁啟智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助研究員

《如水革命：香港人如何在反送中運動集體臨機應變》，何明修著、王湘瑋譯，左岸文化，2026 年 3 月，320 頁。

2019 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至今已過七年。適逢此時，何明修教授著作 *Be Water: Collective Improvisation in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Protests* 的中譯本《如水革命：香港人如何在反送中運動集體臨機應變》出版，再次將我們的關注帶回昔日怒火燃燒的街頭。儘管台灣社會對香港議題的關注熱度已明顯下降，但當年香港人的集體抗爭仍具有重要的分析意義。近年來，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經常被冠以「網絡化」、「去中心化」以及「無領袖」等標籤，而反送中運動正是其中的典型案例，香港輿論一般概括為「無大台」。何明修基於 2019 至 2024 年間共 189 次訪談的紮實研究，為此抗爭的動員過程演變提供了深入的理論分析。本書不僅對關注香港的學者極具參考價值，也對整體社會運動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

全書以 2019 年 8 月 23 日的「香港之路」人鏈行動作為開端，指出匿名的組織者如何在極短時間內成功發動這場香港過去從未如此大規模實踐的人鏈行動，並由此引出一系列核心問題：「為何一場看似沒有領袖的抗爭，卻能持久不墜？沒有事先安排，要如何發明與實踐創新的行動劇碼？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願意承擔個人風險，自願與陌生人合作？缺乏組織協調，如何能進行複雜的分工？在什麼情況下，民

《台灣社會學》第 51 期（2026 年 6 月），頁 135-139

眾能實踐一種全新的行動方式，跳脫所屬文化的既有知識？這種突發的調整，又是如何成為抗爭者之間的共同語言？」（頁 17）。

針對上述問題，作者提出「集體臨機應變」的概念，將其界定為「沒有事先協調的同儕協作之策略回應」。一方面，他指出以「組織主導運動」為核心的傳統模型已顯得不足；另一方面，他亦提醒不應過度浪漫化「無領導運動」——既誤以為所有個體條件相同，亦忽略達致廣泛參與的具體條件。在此基礎上，本書進一步分析反送中運動期間行動者能動性的形成與演變。

首先，在第一章中，作者指出行動者並非一開始就準備好成為「集體臨機應變」一員。香港社會一向以謹慎守法著稱，要讓人們轉而容忍甚至協助違法的抗爭行為，本身需要情感上的轉化與新的動員模式。就此而言，2014 年的雨傘運動留下了關鍵遺產：不僅促成了對公民抗命及組織領導方式的反思，亦孕育出眾多「傘後組織」，為日後抗爭奠定基礎；在反送中運動期間，一連串死亡事件與警方的高壓武力所引發的情緒反彈，則進一步劇烈重塑了行動者的能動性。

接著，在第二章中，作者強調臨機應變並非憑空產生，而是建立在既有能力與資源之上。他將反送中運動稱為一場「富人運動」：許多經濟條件較佳的參與者透過捐款支持後勤工作，以彌補無法親身投入前線的心理落差。本章詳細說明各類後勤工作如何支撐前線抗爭，例如協助勇武派安全撤退、海外採購裝備等，而這些行動又依賴線上群組與線下微觀人際網絡的交織。正是這些密集的社會連結，降低了個體承擔風險的成本，並為臨機應變提供了具體條件。

在第三章中，作者轉而探討去中心化對抗爭運作的影響。他指出「無大台」逐漸成為主導抗爭發起的模式，並分析傳統組織在法律與制度上的限制。在此背景下，「無大台」不僅帶來戰術創新（包括藝術與象徵性行動、激進行動，以及各類「和你」系列活動），亦促成了抗爭在地理空間上的擴散。同時，作者透過多個案例說明，即使在去中心化的條件下，運動仍能維持一定程度的自我協調與修復能力。

然而，在缺乏集中組織的情況下，參與者又如何維持團結？第四

章指出，即使在分散式參與之下，行動者仍能建構共同體的想像。共同的受苦經驗強化了彼此的歸屬感，而警察暴力與死亡事件的衝擊，更塑造出一種「受苦的共同體」。此外，各種自發形成的語言與視覺符號：從「手足」一詞成為日常用語、「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成為運動代名詞、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的流行，到獅子山作為香港本土象徵的反覆利用，共同構築出運動的情感與象徵基礎。

除了本地層面，海外港人亦在運動中被廣泛動員。過去缺乏明確香港認同的離散群體，在反送中運動中連結並建立高度內聚力。作者於第五章指出，2019 年 G20 大阪峰會期間的眾籌登報行動，促成了國際倡議網絡的形成；與此同時，許多原本缺乏港人組織的城市，也因支援抗爭的臨時行動而逐步發展出組織。這些自發行動最終匯聚成運動的「國際線」。

最後，第六章將焦點轉向密集抗爭結束後的「後動員」階段。行動者透過多種方式延續運動目標，包括黃色經濟圈、組織新工會、選舉路線、另類媒體和出版，以及法院和監獄支援等。同時，作者亦指出，在政治與法律環境劇變之下，各種後動員形式的持續性呈現出明顯差異。

綜上所述，本書細緻呈現了香港行動者如何在缺乏中心領導與指揮的情況下，透過「集體臨機應變」創造出一場在規模與行動強度上皆超乎想像的抗爭。因此，本書不僅是對反送中運動的回顧，更指出即使缺乏事前規劃，即興行動仍可展現出高度的集體性與策略性，從而構成對動員理論的重要推進。

在理論層面上，本書採取「行動者社會學」的視角。回顧社會動員理論的發展，許多研究傾向運用結構性隱喻進行解釋，但作者認為，若直接套用於反送中運動，將難以凸顯行動者的策略選擇。近年雖有研究重新重視情緒面向，但協調過程中的能動性仍未獲充分討論。從這個意義上說，主張臨機應變可以是集體的，實際上為傳統結構導向的分析提供了多一條進路。

作者特別強調，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並不必然等同於完全扁平。

由於反送中運動缺乏一個嚴格規範參與形式的指揮中心，不同場域與專業背景的行動者得以各自尋找參與的位置：街坊鄰里可以從在地議題出發，海外香港人得以連結國際關注，而插畫師與漫畫家則透過視覺語言自發介入運動。正因如此，運動展現出高度的多樣性與開放性。然而，在肯定眾多無名參與者貢獻的同時，作者亦指出，既有的領袖人物與倡議組織並未因此完全失去作用。相反地，他們在特定情境中仍扮演關鍵角色，承擔了往往只有他們才能完成的功能。對此，建議可參考李立峯（2021）的觀察，很多參與者都不是以純粹「一般市民」或「公民」的身分參與這場運動，而是動員了大量的社會角色，從專業身分如律師和救護員，到更廣義的社會角色如「銀髮族」等。這些眾多社會角色為去中心化的參與帶來一定的結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未一味讚頌「集體臨機應變」，而是同時指出其限制。例如，自發的文宣生產雖然釋放出驚人的創意，但亦難以約束部分帶有歧視意味的內容。一些呈現厭女傾向或將對手非人化的作品，反而成為批評者攻擊的切入點；此外，部分原本同情抗爭的中國大陸自由派新移民，也在共同體建構過程中被排除在外。

「集體臨機應變」的限制在國際線尤為明顯。國際遊說，尤其是涉及具體法案推動時，往往需要高程度的協調，以避免內部混亂。同時，海外媒體與政治人物也傾向期待具代表性的領袖人物出面發聲。而在尋求合作對象的過程中，離散港人對當地政治議題的分歧亦難以避免，例如圍繞川普及左右翼政治立場的紛爭，便是一例。

作者以國際線為案例，說明缺乏協調可能帶來的混亂；這種情況在香港內部亦十分明顯。馬嶽在討論和理非與勇武的互相關係時，對運動內部的協調能力就明顯較有保留。馬嶽雖然也有提到運動內部沒有清楚的領導架構，而不同人士對運動走向都可以提出討論；但他亦指出到了運動後期，這些討論對前線行動的制約能力有限，並為運動帶來影響（馬嶽 2020）。

拉闊去看，反送中運動早期的行動者（特別是勇武派）強調應如水般流動，避免雨傘運動中死守佔領區所導致的策略僵化與行動

風險，作者亦據此將反送中運動命名為「如水革命」。然而，隨著運動進入中後期，特別是在「理大圍城」期間，行動者未能貫徹流動策略，反而陷入被圍堵的困境。在此意義上，或許可以進一步追問：在缺乏有效宏觀協調的「集體臨機應變」之中，是否連運動最核心的「如水」原則本身，也可能在關鍵時刻被錯過或無法落實？

如是者，「集體臨機應變」的協調能力上限為何？在策略回應之外，它能否形成集體認同的宏觀戰略？反送中運動雖然有衍生出行動者普遍認同的「五大訴求」，但對達成的路徑的意見不一則在「兄弟爬山」的訴求面前被略去，內部矛盾在「不切割」的大前提下被無視甚至壓抑。「攬炒論」是否僅為威脅選項，還是要付諸行動的路線圖？如果是後者的話，政權在反送中運動的後續回應帶來香港的政治經濟環境全面改寫，是否代表「攬炒成功」？這些問題恐怕在行動者之間從來未曾存有共識。

何明修在結論的部分列出了 2020 年至 2022 年之間的五場抗爭：美國 BLM 運動、泰國學生反對軍政府、緬甸反政變運動、伊朗反頭巾運動，以及中國的白紙革命，並指出這些抗爭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有多個共通點：道德震撼、廣泛參與、訴求激進化、跨境行動，和社群媒體。作者主張「集體臨機應變」為這些去中心化大型社會運動的共通點提供了概念上的解釋。作者亦認為當代社會的一些發展促使了社會運動的去中心化：群眾組織衰退、抗爭者對「本真性」的追求、資訊社會的出現，以及威權化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社會運動帶來的制度改變都相對有限；但這不代表去中心化的抗爭不能取得制度上的革新：2024 年 7 月的孟加拉和 2025 年 9 月在尼泊爾爆發的「Z 世代抗議活動」就是相對成功的案例。可期待未來的研究者把「集體臨機應變」應用在這些案例的分析當中，並帶來豐厚的成果。

參考文獻

李立峯，2021，《時代的行動者：反修例運動群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馬嶽，2020，《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左岸文化。